

1980—2010：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邬沧萍 谢楠

(中国人民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

提 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到略低于2,创造了中国人口奇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发展了人口学,为计生工作创造了良好环境。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布被认为是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此后,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将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从政策法规制定、物质投入和组织建设各方面为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保障,使中国人口控制成功度过“爬坡阶段”。

关键词： 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控制

中图分类号： C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1)01-0001-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位列世界前茅,2009年GDP位居世界第三,综合国力极大增强,堪称人间奇迹。而同时,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控制人口的成就完全可以同经济快速增长相媲美。西欧用一个多世纪才使妇女由1850年平均生5个孩子降到1950年的2.5个;中国只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把原来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略低于2个,令世界惊叹。许多专家学者都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起飞与中国人口的有效控制并称为中国三十年发展的两大奇迹。

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来源于改革开放一样,中国人口奇迹的取得也完全得益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从根本上使人口学和人口计生工作摆脱了长期以来教条主义的束缚,敢于独立思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走自己的路,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口、计生事业发展的路。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此后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为人口计生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社会学、人口学等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把许多从事过人口学教学与研究的知识分子都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其后“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继续发展,以马寅初《新人口论》为代表的人口理论遭到更严厉的政治批判。1959年以后,人口学成为社会科学上的一个禁区长达二十年。毫无疑问,人口学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之一。

(一)政治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取消了人口学,扭曲了人口理论,中国失去控制人口的最佳时机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针对中国人口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领域内很早就产生过争论,但在新中国成立前,人口问题并非大众关注的焦点。

1954年11月,中国公布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调查显示中国总人口超过6亿(601938035人),其中大陆人口就达到5.8亿,这大大超过中国人口数量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固有观点。因此,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一经发布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人口问题一时成为社会广泛关注讨论的焦点。在当时相对较为民主的社会氛围下,相对广泛的社会讨论中逐渐出现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一派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代表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另一方则针锋相对地坚持认为中国无须控制人口增长,主要以王亚南的《再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为代表,包括一批深受前苏联理论观点影响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使得我们处处以前苏联为师,在意识形态领域也不例外。许多人教条地将前苏联的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所必读的权威著作,该书将前苏联当时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概括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这对扭曲我国人口理论有深远影响。该书两处写道: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人口规律已经失去效力,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表现为:人口不断迅速增加。”^[1]“人口不断迅速增加,……这就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2]

所谓的“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简而言之就是“人手论”,单纯强调人口数量应该不断增加。这成为了批判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依据,也是许多学者、权威在学术讨论中反对控制人口的“大棒”。随着左倾路线的大行其道,谁主张中国要控制人口增长谁就是同意中国有人口过剩就是马尔萨斯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标准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影响十分恶劣,既否定了真理有客观标准,又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二)反右扩大化和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大批判,把人口学作为一个学术上的“禁区”长达二十年

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已有许多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在不同场合讨论控制人口、节制生育问题。当时民主

讨论氛围相对浓厚,对人口问题的讨论处于正常学术探讨范围内,各种观点层出不穷。1957年7月《人民日报》还发表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人口问题讨论达到高潮。但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人口问题作为重要突破口。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标志着人口问题探讨的民主、学术氛围的终结,此后人口问题被迅速政治化。紧接着几位著名人口学者被打为“右派”,其后1958年开始持续到1960年掀起更大规模的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更使得人口研究此后近二十年都成为学术上的“禁区”,几乎没有学者敢问津。

(三)人口理论的扭曲对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害

有人认为50年代把人口学的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批判时,确实对人口理论界、学者、知识分子有影响,但对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没有多大影响。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一,理论上的扭曲,不能不在计划生育指导思想上束手束脚,在计划生育工作宣传上投鼠忌器。如果比较改革开放前后有关人口计划生育文件内容中对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紧迫性时不同的阐述时,就不难看到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例如,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指示中,谈到计划生育,只谈到“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教育后代,有利于男女职工生产生活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的健康和繁荣”^[3]。在行文中没有以我国人口多,粮食、就业和人民生活等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来论证开展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深恐与马尔萨斯划不清界限。因此,不能不认为人口问题的大批判仍有它很大的滞后影响。连有些高层领导同志也怕同马尔萨斯划不清界限,而且直言不讳。

其二,人口学成为学术禁区,将近20年没有人愿意从事人口学研究。因此,人口计生工作缺乏人口学智力支持,在理论、宣传、调查研究、预测规划等等不能不受到影响。

(四)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确立为控制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工作开辟道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中国思想界得以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证明,正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得中国人口学界能冲破“极左”人口思想设立的禁区,勇于探索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发展社会主义的人口理论,为中国的计生工作提供智力支持;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得我们能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上直面中国人口问题,为中国计生工作的开展创造更好社会舆论宣传环境^[4]。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掀起的思想解放的热潮中,人大人口所的刘铮和邬沧萍在《人民日报》和《红旗》相继发表《人口非控制不行》和《控制人口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等文章,这是《人民日报》差不多事隔二十年后,第一次在理论版上发表人口文章。此后,人口学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了一门广受社会关注的学科。

随着人口学的逐渐发展,我们对中国人口规律的探索与认识也逐步深入。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中对人口问题的论述,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等人口学理论,科学解释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推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使得我们能从我国人口多,粮食、就业和人民生活等重要而敏感的问题来论证开展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同时,随着对我国人口发展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化,人口学界能越来越多地为计生工作出谋划策,提供更好的智力支持^[5]。

其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使我国计生工作的社会宣传氛围有了极大的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战略任务和一项基本国策,整个社会对计划生育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以各种形式为计划生育广造舆论。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各个地区的大街小巷中看到种种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和口号。其中许多标语口号,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已不合时宜,有些也不够科学。但不可否认,正是改革开放后这种对计划生育全面的宣传才使计划生育的观念如此迅速地深入人心,使我们的生育观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二、国家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各个方面投入极大

1980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公开信》的发布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此后,国家从政策法规制定、物质投入和组织建设各方面为人口计生工作提供保障,投入之大,与之前相比有天壤之别。

(一)组织建设和物质投入保证了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开展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战略任务和一项基本国策。国家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投入极大。就计生组织机构来说,直到1973年7月国务院才正式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编制10人,由卫生部代管,这种代管状态一直持续到1978年6月,编制仅为20人^[6]。改革开放后,1981年3月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兼任主任,行政编制60人。2003年3月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内设机构和行政编制比组建时成倍扩大,领导力量大大加强。

当计生办隶属于卫生部时,并没有下属机构,只有部分基层配备了开展节育手术的卫生人员。以1963年为例,全国在职计生干部仅为2000人,且主要以卫生干部为主。“文化大革命”以后,计生工作基本瘫痪。改革开放后,开始有计划生育专职干部,1989年全国县级计生机构增加了8000名干部编制,1995年计生委专职工作人员40.6万^[7],2005年人口与计生系统工作人员50.9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6.2万,已经形成一支庞大的队伍。

其次,从投入经费上我们也看出改革开放前后国家对计划生育的重视程度有明显的不同。

表1 1965—1980年国家计生工作投入经费统计表

年代	1965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投入经费 (万元)	2763	5952	7547	12348	14031	16920	16781	17527	19764	25130	33152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每年拨给计划生育工作的经费并不多,直到1973年经费才超过一个亿,并且每年的经费增长幅度并不大。而改革开放后,国家拨给计划生育的经费迅速增加,1979年的经费比上年增加了五千多万,而1980年的经费与上一年相比又增加了八千万!这种增长幅度是前所未有的,集中体现了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巨大投入,保障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深入开展。无论是投入的规模、还是投入持续的时间都是改革开放前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从侧面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我国人口政策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保障了计划生育的深入开展

以系统完善的政策、法律指导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计划生育的重要特征。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意味着我国政府把计划生育工作提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反映出实事求是路线确立以来政府对我国基本国情——人口多、底子薄、环境压力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这无疑将极大地推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进入8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人口问题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的深入,中央将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位置。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在1991—1996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召开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反复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

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我国人口增长模式的转变,2000年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新时期的计划生育工作指明方向,同时进一步明确,“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2006年12月1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同时,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计划生育工作也被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法治新阶段。

三、中国人口奇迹来自《公开信》发布后计生工作的巨大成就,成绩不容低估

中国只用30多年的时间就把原来平均生6个孩子降到略低于更替水平,成就举世瞩目。这为我国快速发展制造机遇期,其成就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遗憾的是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认为无关宏旨,不值一提。这无疑是一种偏见或短视。但是有些人口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中也认为改革开放对人口事业的影响有限,远不如对政治经济等领域深远。有人就认为《公开信》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是盲目的、是仓促的,并没有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负面影响极大。也有人认为

《公开信》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有限,而70年代初开展的为时不到十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已把总和生育率由6降到2.75,此后生育率继续下降,下降到更替水平,降幅更小,但用时更长。

这两个论点似是而非。首先没有对80年代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其次对中国的人口规律缺乏准确认识。

(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面临极为严峻的人口形势,实行强有力的人口政策刻不容缓。

人口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就在于人口的增长规律极为特殊,包括积累性、周期性和惯性等特征。同时,人口增长过程中还会形成呈队列状态的人口高峰。一般来说,人口增长在初期增加量都很小,往往用百分比甚至是千分比来计算,不引人注目,也容易被忽视。但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和积累将逐渐形成一个生育高峰,而生育高峰一旦出现,就必然要持续生育第二代、第三代以形成一个接一个呈队列状态的人口高峰。当人口高峰一旦出现,就不得不需要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才能逐步缓解。可见,人口的生产与物的生产存在鲜明差异,研究人口必须瞻前顾后,通盘考虑^[8]。

另一方面,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其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综合因素,必须权衡长期短期的利弊得失。而8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在对中国国情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正确决策。三十年来的实践也证明了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性。

(1)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面临两个人口高峰压力,人口控制迫在眉睫

如图1、2所示,我国有两个人口高峰: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60年代的峰值更高,如果不是由于三年困难时期,两个高峰就连接起来,从图上看到第一、第二个人口高峰叠加起来成为一个更大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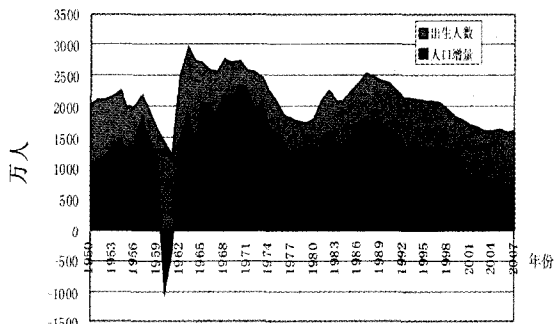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量变化情况(1950~2007年)

资料来源: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7),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

(2)上世纪80年代育龄夫妇的数量与过去相比大幅度增加

有人认为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公开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一种只顾眼前不考虑将来的短视行为,甚至不过是某些领导人心血来潮时提出的“惊人之笔”^[9],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我们认为,恰恰相反,这一政策是瞻前顾后的,是异常果敢的^[10]。从2004年的人口年龄金字塔中可以看出,

40~50岁年龄组的人数与其他组相比明显要多出一大截,而这个年龄组的人在80年代初期正处于生育旺盛期。当我们仔细对比我国每个历史阶段育龄夫妇的数量时,我们会发现80年代后每年都是一千多万对,比五六十年代的育龄夫妇多一倍。如果我们在80年代初期不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那今天中国人口的规模就会高达15亿,甚至更多。我们将不得不面临更为被动的人口局面,同时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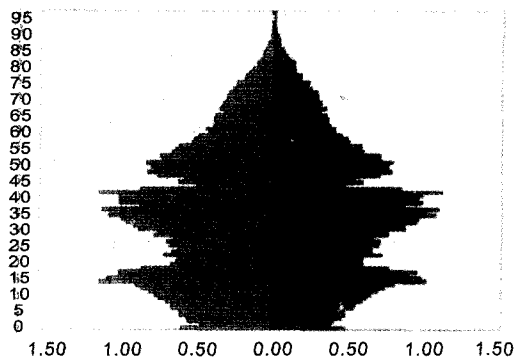


图2 2004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

资料来源:陈卫,宋健.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国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人口研究,2006,(2).

另一方面,如果当时对计划生育要求不那么严格,标准不那么高,短期看,一年多生一两百万相对于庞大的人口群体而言并不起眼,但是二三十年的逐步积累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每年多出生的人口,还要生育第二代、第三代,这就将推迟中国人口增长到达顶峰、中国人口形成相对稳定的时间,这对我们子孙后代影响就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80年代初期《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是中央权衡利弊得失所做出的果断决策,更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利益。

(二)进入80年代,中国人口控制处于爬坡阶段,计生工作形势更为复杂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迅速下降:由6降到了2.75,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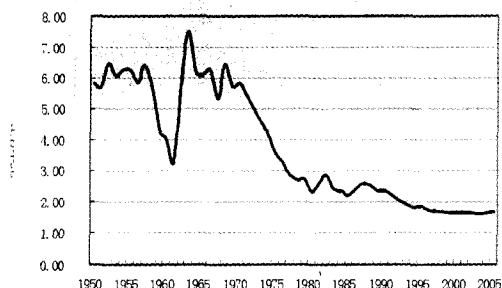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的生育率下降,1950—2005年

资料来源:姚新武,尹华.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庄亚儿,张丽萍.1990年以来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进入80年代,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下降到更替水平,降幅更小,但用时更长,在8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反弹,这是不是意味着1980年后实施的人口计生工作和政策有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开信》发布后所实行的计生政策适得其反?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关系到《公开信》发布后的人口计生的路

线方针政策是否恰当。

诚然,改革开放前的计生工作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取得如此成就殊为难得,但绝不能以此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计生工作不如前者。因为我们仅用出生率、生育率两种指标来衡量计生工作的成就具有极大地片面性。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不仅能认识事物的现象,更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不仅看到指标的差异,也看到造成指标差异背后的人口结构和胎次结构等等的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开始进入育龄期,人口中育龄人群比重迅速上升,出生率在这一时期上升受育龄人群规模大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能由此认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率一时上升表明计生工作不如改革开放前。

(1)生育率下降是个历史长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任何一个国家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会有停滞和反复,呈周期性起伏。越是接近更替水平下降就越慢,这是各国的普遍共同规律。欧洲国家有过,日本也有。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达到更替水平,而许多大体同中国开展计划生育的起始时间差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泰国、印尼等,其达到更替水平都比中国晚10~20年。发展中人口大国迄今除中国外尚无一国达到更替水平,大多数尚在TFR2—3徘徊,生育率下降有如登山运动,开始是比较容易的,但接近顶峰时步履艰难,我国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正处于爬坡阶段。

(2)1980年前后计生工作的对象截然不同

1970年开展的计划生育的对象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人口,年龄多在20岁以上,大多数已生育过2~3个孩子,部分人已有多达4~5个,同时许多人自身也已感受到孩子太多对生活和工作压力。因此,向他们宣传计划生育工作比较顺利,生育率也会随之大幅下降。几次生育调查都证实:在1970年开展计划生育时,大量减少的是多孩生育。下表是1970—1979年多孩生育率下降的资料。

表2 1970—1979年出生孩中多胎孩率

年代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出生儿中多胎孩(%)	57.37	57.59	57.39	55.13	53.28	51.46	47.73	43.99	37.78	30.09

资料来源:钟国琛等.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报告集(生育卷).中国人口出版社,1993:44.

80年代的计生工作对象则截然不同,计划生育面对的是红旗下出生于第一、第二个人口高峰期的生育旺盛人群,有的只生育过1或2个,有的尚未生育。此时靠减少多孩率来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空间很小,工作的重点则是让生育过1~2孩子的妇女不再生育,让未生育过的妇女尽量只生一个。另一方面,根据改革开放初期调查,当时妇女平均生育意愿为2.5个小孩^[11],已接近更替水平这个临界点。此后再进一步下降就比1970年要困难得多,真可谓是“攻坚阶段”。在农村各项工作中,计划生育工作被认为是“天下第一难”,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针对80年代生育率的反弹,有学者利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深入研究,发现1980年生育率同过去比不但未降而且略有回升时指出“基本上由于结婚和生育年龄的变动或时间上的推移,而不是由于平均一对夫妇生孩子多而变动”^[12]。

可见,1980年前后生育率下降速度的原因各不相同,面临的困难不可同日而语,足见《公开信》发布后的计生工作成就不容否认,更不容否定。

四、展望未来,新世纪的中国人口面临新问题,迎接新挑战

(一)中国人口任重而道远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少生三、四亿人。人口数量增长的有效控制对于缓解人口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压力助力甚大。我国现实的人口情况是:人口规模依然庞大、人口将维持惯性增长一段时间、生育率反弹的风险还存在。同时由于强有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率迅速下降,将带来一些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诸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出生性别比失衡等问题。

根据第五次全国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严重失衡,接近120:100,部分省市甚至接近130:100。二十多年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已造成男性比女性“多出生”三千万人左右^[13],如果这种失衡状况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方面,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14],当今中国的GDP总量约为世界的7%,人均GDP仅为三千多美元,但我们却要支持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群体,养老资源的严重不足与庞大的老年人需求之间矛盾非常尖锐。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经济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面临发展方式转型、能源相对紧缺等诸多困境,同时也要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老化、社会保障负担沉重等问题,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在为三十年计划生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欢欣鼓舞的同时,更要对我们今天的人口问题、人口形势有清醒的认识,明白中国人口问题任重而道远。

(二)新时期,应以新的思路应对中国人口问题

在新时期,面对中国人口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该以新的思路来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2006年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统领下,中共中央提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把稳定低生育水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提出来。

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很多人依旧用传统的观点方法来应对。例如有人提出采用放宽生育政策的方法来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无疑,在中央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人口政策后再提出放宽生育率就意味着希望将生育水平提高到更替水平以上。这从全局上看并不是一项好的政策^[15]。首先,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首要目标是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而放宽生育将推迟人口增长达到顶峰的时间,扩大人口规模,并推后人口规模实现相对稳定的时间;同时,现在增加的出生人口,六十年后也将进入老年期,长远上看并无助于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其次,中

国人口老龄化未来二三十年的深度发展是由于上世纪两次人口高峰梯次进入老年期所致,因此增加新生人口对于现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而言属于“远水救不了近火”。再次,新增人口需要将近二十年的抚育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一定时期内社会负担的增加,可能会形成社会对老少负担的“两头沉”,加剧社会资源与庞大的被抚养人口需求之间的矛盾。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别在于各个地区出现的早晚和进度的快慢。而在人类平均寿命延长、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的社会环境下,老年比都在25%左右。因此对于人口老龄化我们需要积极准备,但也不必过度忧虑。关键在于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统筹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2]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文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594,596.
- [3]彭佩云主编.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4.
- [4]邬沧萍. 改革开放拯救了人口学,也为人口学茁壮成长开辟了道路[J]. 人口研究,2008,(5).
- [5]邬沧萍. 人口学在我国是一门无可替代的社会科学——亲历新中国人口学60年沧桑的再认识[J]. 人口研究,2009,(5).
- [6][7]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689,690.
- [8]邬沧萍,谢楠. 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国的必然选择[J]. 同舟共进,2009,(4).
- [9]邬沧萍. 《公开信》是人口领域改革开放的号角[J]. 人口研究,2010,(4).
- [10]邬沧萍. 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N]. 人民日报,1980-11-04.
- [11]路遇. 新中国人口五十年[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129.
- [12]查瑞传,季咏华. 中国妇女生育状况分析[A]//李成瑞主编. 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北京国际讨论会论文集[D]. 北京:1984:625.
- [13]原新. 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规模的判断[J]. 人口研究,2007,(6).
- [14]邬沧萍,何玲,孙慧峰. “未富先老”命题提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J]. 人口研究,2007,(4).
- [15]邬沧萍,孙鹃娟. 用提供生育率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后患无穷[J]. 红旗文稿,2007,(11).

作者简介:邬沧萍(1922—),男,广东番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老年学。谢楠(1985—),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老年学、人口文化。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三川